

蔡和森文集

(下)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蔡和森文集

(下)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光耀 忽晓萌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汪 莹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和森文集:全2册/蔡和森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ISBN 978-7-01-012164-2

I. ①蔡… II. ①蔡… III. ①蔡和森(1895~1931)-文集

IV. ①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1151号

蔡和森文集

CAIHESEN WENJI

蔡和森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68.25 插页:4

字数:764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12164-2 定价:16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义和团与国民革命

（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

中国农民群众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起事，第一是鸦片战争中广东的平英团及各乡团，第二是一九〇〇年蔓延北方各省的义和团。二者都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的与间接的）不堪忍受的反射运动，而后者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比较的更为严重更为悲壮。

然而义和团运动不仅被他的敌人外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普通宣传为中国野蛮的排外举动，就是他的连带责任的同胞——甚至于革命党也公然这样的指斥他。他们不是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声明这是少数无知愚民的罪恶，便要把自己的革命说为比较满清或军阀更进一层的尊重对外条约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文明行为！

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但是对付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

这时候，农人群众迫切的需要是反抗洋人。因为帝国主义武

装送来的外国商品、鸦片烟、传教师，不仅使农人手工业者不停的破产与失业，而且使他们不停的吃洋官司，懊洋气，洋教的势力横行乡里，莫可谁何。这时候，自方镇总督以至地方官，自李鸿章袁世凯以至二毛子三毛子，莫不渐渐成为孝顺洋人的机械；独在朝之顽固的王公大臣富有排外思想。于是这些王公大臣遂成为一时的历史的工具，起来利用并领导这种“扶清灭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因此，反动派与开明派之间成为这样一种可耻的对照：前者顽强不屈的去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后者奴颜婢膝宣告不顾北京形势如何，对于外人条约权利保护不怠（这是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联合通知上海领事团的话）去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袁世凯（山东巡抚）在这时候更以“保护外人剿讨逃匪”树立他以后在外国帝国主义者中的被雇人地位。

义和团排外的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可是这种本能的幼稚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不是没有缺点。他的缺点是在方法上面；然而这种缺点是历史限定他的，并且是必然的。在尚未发明铁器的美洲土人和非洲土人，他们或在半开化时代或还停滞于野蛮时代；当欧洲“文明”人携带近代的新式武器与技术来侵略他们的时候，他们怎样去抵抗呢？自然，不仅只能运用已有的腕力石器弓箭等去抵当大炮与机关枪，而且只能运用半开化的或野蛮时代神秘的宗教势力去团结他们并鼓舞他们的勇气；除了这些已有的物质与精神的武器之外，他们一时是无可如何的。义和团亦然，按照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当然只能容许农人拿着刀、枪、矛、锄、张真人、吕洞宾、神兵、天

将……去与大炮机关枪以及帝国主义者一切近代的知识技术去决胜负。

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这是义和团的致命伤。所以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的结果。然而这种历史的失败包含着神圣的意义；换过说，被侵掠者抵抗侵掠者的战争乃是神圣的战争；这种战争虽败犹荣。是故义和团虽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失败，但决不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减其运动之历史的神圣的价值。

义和团失败后十一年，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以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比较，形式与精神都大不相同：辛亥革命一面完全采取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式；别面完全抹煞了庚子起义的排外精神。不仅完全抹煞排外的精神，而且于此精神的反面再三向国际帝国主义宣言革命政府将怎样加倍的尊重“友邦”条约及个人权利，怎样革除（满清时代）通商与实业之障碍以待外资之开发，怎样期望跻于所谓文明国家之林，以享文明国家应享之权利与应尽之义务。

这种非革命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精神与期望，现在已证明其完全错误与无效。引起这根本错误的原因，大约不外下列三事：第一，没有认清中国革命运动之国际的性质，即没有认清中国的革命为普通一般殖民地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非单纯对内的民主革命。第二，不知道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决不会帮助他所欲永远掠夺的殖民地经济落后国之独立自主的民主革命运动。第三，鉴于洪杨革命（太平天国）未与帝国主义列强讲外交之失败。

自资本主义发达到帝国主义，显然把地球各部分经济落后的

民族圈定于他的隶属地位，而不容其翻身。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从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显然不同。从前的资产阶级不自觉的在各方面（主要的是经济与政治方面）都尽了一种革命的作用，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革命，而且要帮助别国同阶级的人完成其革命。现在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则不然，他反而成为全世界一切反革命的中坚，尤其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必出死力以维持这些地方封建的半封建的旧制度与旧势力（在印度、在中国、在高丽，都是一样的），因为这样于他是极便利的。所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闭着眼睛模仿一二世纪前单纯对内的民主革命，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而希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他以帮助更是莫明其妙的昏谬。这种昏谬在洪杨革命中是没有的（洪杨李秀成等皆耻求助于外人——侵掠者）这正是洪杨革命的卓越。不然，岂有真正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能与外国帝国主义讲外交而成功？

然而这些昏谬的趋向，在辛亥革命以及在现在国民党的右翼中还是很严重的。他们或是卵翼于外国帝国主义之下的革命代表，或是久居租界受惯外人之保护的元老，他们不仅不赞成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且攻击如此主张之左派诸人为破坏国民党，嚷为什么“开罪友邦”！

所以辛亥革命，表面上似乎比义和团运动进步一些，因为形式上和精神上都似近代资产阶级化；然而实际上，这次革命是完全失败了，他的意义远不如义和团之重大。义和团是因为没有近代化而失败，辛亥革命却反因为效颦近代资产阶级化而失败。这是怎样说呢？因为革命党不知按照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性质和人民群众反帝国主义的忠实需要去把革命弄实在，他们只知拘守从前

欧美资产阶级改革内政的目的，一天一天的把革命弄虚空。因此，他们只知以军事行动，建立政府，求援“友邦”为惯用方法，而不知道这些方法都是离开群众的需要而得不到结果的。不仅得不到结果，而且要使革命濒于危险与破产。群众对于军事行动与革命政府之不满意，对于抽象的主义宣传之厌听，一切实际的政治宣传与群众组织工作之不能施行，甚至于有时宣布禁止排外……，这些都是危机的兆朕。

然则可知陈旧的方法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是于中国革命无益，而且可以杀死中国革命的。要挽救这危机只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而受其感化之一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革命弄实在，才能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爪牙——中国军阀作战。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这样同盟的结果是要使义和团的遗烈先被于东方的。

最后我要在义和团与国民党之间说几句话，以做这篇文字的结论：

国民党自今年第一次大会改组以来，他已具有一个顶好的明确的政纲；假设当时义和团具有一个这样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义和团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反之，现在具有这好的政纲之国民党，若加以义和团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真精神，国民党更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的。义和团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排外精神，我们希望国民党双肩承受这种伟大的遗产！

商团事件的教训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这次广州商团事件，可谓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组织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在广州各机关之职员；领导这次叛乱的是陈廉伯、陈恭受诸买办；公开的袒护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武装调停”廉价拍卖革命政府的是范石生廖行超诸军阀；而勾结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之间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

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香港广州的买办阶级，一面勾结雇佣军阀以把持广州兵政、市政、财政诸权利，这是自从设立广东政府以来公然不可讳言的事实。这次事变的罪魁陈廉伯不仅是汇丰银行的买办，而且是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广州市党部之职员；这次主张罢市反抗孙中山最力的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及西关各大商店的经理职员以及陈恭受等莫不尽是国民党右派的党员，至于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辈之属于右派更不待说。所以这次一面是英国帝国主义打击中国革命运动，一面是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

国民党右派之必然的趋于反革命，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外国帝国主义要根本破坏中国的革命，单从外部施以压迫还是不

够，必须培养一支反革命的势力于革命党的内部，这支势力便是国民党的右派。

所以这次事变的教训：第一是证明国民党右派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第二是证明雇佣一些军阀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过早的设立革命政府之失策：

全部政权的取得是革命党必要的目的；但在革命形势还没成熟以前——即本身在民众间的势力还没成熟以前，是不宜于亟亟掌理一部分的政权或建立偏安一隅的革命政府。不幸中山先生竟然采用了这种过早的政策，由是显然暴露下列各弊害：（一）广东政权之取得，并不由于革命势力之完成，但是由于利用根本与革命相反的军阀财阀的势力，所以广东政府不仅不是革命的工具，适足成为雇佣军阀、交通系、政客、买办阶级以及升官发财的右派之狐城鼠社；（二）党员对于政权的争夺早已根本毁坏了革命的目标与精神；（三）雇佣军阀以养寇纵敌为长久敲诈军饷之法宝，军役不停，苛税繁重，因而引起人民对于革命之反感与不信任；（四）全力用于毫无结果的军事引动上面，党务以及在民众间的发展完全因而停止；（五）苟安于香港英国政府的炮舰政策之下，不仅不敢发展国民革命的宣传，而且时常要受内外勾结的威胁，如这次商团事件便是明证。

这种不幸的政策不仅可使革命完全破产，而且危及于中山先生个人之生命与人格。军阀的工作是拥兵敲钱，右派的工作是争权夺位，而老头子的工作却是打前敌当炮火！军阀是利用革命做买卖，反革命的右派是利用政权做生意，而老头子遂常常的被强迫而成为他们的商品！

我们为挽救革命的破产计，为爱惜中山先生个人计，都希望

中山先生在受了这次奇耻大辱的教训后不仅要毅然决然与英国帝国主义宣战，而且要毅然决然抛弃以前不幸的错误政策，澄清党内右派反革命的法西斯蒂！

（载《向导》第82期 署名：和森）

北伐呢？抵抗英国 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现在有两个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横在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前面：一个是怎样对付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右派诸叛徒及滇军等都包括在内）在广东做成的反革命；一个是怎样对付美日两派帝国主义在全国做成的直系与反直系两派军阀间的战争。

对付商团事件的正当政策，只有坚持没收全部扣留的军械，否认范廖二军阀与商团私订的六条件，进一步完全解除买办阶级（商团军）的武装，实际抵抗英国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唤起全国人民之同情与助力，而开始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新时期。对于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站在国民革命原则上的国民党，只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对于人民的屠杀，反对帝国主义构成内乱借口干涉的阴谋，号召全国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群众集中于自己的旗帜之下，发展并组成国民革命的真实力量。

但据最近上海各报所传消息：中山先生对于前一问题，于痛斥英国帝国主义的宣言公布后，忽然又向粤人发表一类似“罪

己诏”的宣言，悉率客军北伐，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对于后一问题，则已决定实行北伐，响应浙卢。这种政策的内容：第一是中山先生离开广州而赴韶关，以避免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不仅发回扣械，而且以广州市政交与反革命的商团（商团干事李郎如已代理公安局长）；第三是与陈炯明妥协，所谓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便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这就是现在北伐政策的背影。

所谓“护法”“北伐”虽是国民党以前的传统政策，但这种政策曾经屡试屡败，而且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的新政纲，这种过去的错误政策尤属成为废物而不应该复活。现在居然复活起来，我们敢大声说，这又是右派包围中山先生的成功。右派因为恐怕中山与英国帝国主义冲突而打破他们的巢穴，因为要成功与陈炯明的调和以巩固他们与左派对抗的武装势力，因为要讨好段、张、唐继尧等军阀以遂其蝇营狗苟奔走南北升官发财的勾当，所以又包围老头子出此名为“北伐”而实属投降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的下策。

退一步就北伐政策的本身而说，我们亦完全不能予以赞同：第一，这种政策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号召。第二，这种政策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第三，从新成就西南军事局面不过又是从新成就唐继尧、陈炯明、沈鸿英、唐绍仪等军阀政客将来与任何一派战胜的军阀做买卖的基础。

或问你们这样主张不怕右派指为破坏革命暗助曹吴吗？我可大声回答：只有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右派是破坏革命，只有主张交还广东于陈炯明和商团的右派是暗助曹吴。我们在革

命的政策上和理论上素来不赞成雇佣军阀的军事行动，素来反对在广东设立有害革命进行而徒利于官僚份子非革命份子的革命政府；我们现在更坚决的主张：与其强颜交还广东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上什么北伐政策的鬼当，无宁抛弃广东而与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决一死战，以开始全国反帝国主义的真正工作！

（载《向导》第83期 署名：和森）

警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这次广州商团事件，对于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革命成分要算实际做了一次最良的试验。右派反革命的原形，勾结帝国主义的劣迹，在这次事变中业已暴露无遗，此处无庸赘述，所最可注意的是中派在这次事变中的态度。据本报巨缘君广州通信所纪述，中派诸要人在这次事变中的态度可以“犹夷妥协，居中取巧”八大字包括之。这种态度若在俄罗斯革命史或西欧革命运动史中遇着，吾人绝不奇怪，因为若干被实际革命潮流所淘汰的妥协派，无不源于这种病根而破产；但如过早的在中国现在的革命运动中便发见着，吾人诚不胜其遗憾！

革命的方向只有一个，违背这一个便要趋于反革命。所以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决不妄想执两端之术，因为如此便要离开革命的立场而丧失自己的信用与地位。比如沙面罢工，反映到国民党内部，天然的只能引出两种倾向，一种如左派始终忠于群众的利益反抗帝国主义到底，一种如右派马超俊等谄媚帝国主义欺骗并威吓罢工群众使其迅速屈服；犹夷动摇于这两种倾向之间，实际上无异间接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丧失群众的信任。商团事件亦然，或是站在右派反革命及勾结帝国主义的方面，或是站在左

派主张果决解除反革命武装抵抗帝国主义方面；调和妥协于这两种倾向之间，实际上亦无异间接做了反革命与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引起群众深深愤激的反感。

革命所需要的是真本领（适合群众要求的政见与口号）真勇气，专靠使巧，不仅没有用处而且容易弄到自杀的绝地。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吾人颇重视之，常勉以成就中国革命大业；在左派领导之下的广东工农群众，对于他们亦有相当的好感。可是沙面罢工商团事件一来，群众对于他们的观感业已大不如前。中派诸公不于此时有所觉悟以图挽救（即毅然决然没收扣械以开始镇压反动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工作），反而想用暗渡陈仓的方法，回避革命和一部分商团份子妥协，以成立半军阀（李福林）半买办阶级（李朗如）的新局面。这样一来，吾人不仅为革命前程危，而且为中派诸公自身危！这样回避革命巧取政权的下策，不仅要使广州政府完全葬送于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池沼之中，而且中派诸要人势将蹈右派的覆辙而丧失自己革命的政治命运。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的警告中派诸公：做官与革命，截然是两途，你们这次上台的目的，革命的群众是完全不了解的；你们上台后怎样解决扣械问题，怎样对付反革命和帝国主义，革命的群众却正在加倍的注视你们。现在木已成舟，你们暗渡陈仓的幻想完全要归于失败而且是不荣誉的失败，你们若还不愿从此断送革命的前途，决心挽救这种失败，那末临崖勒马，仍然只有赞成中山先生及左派，没收扣械与一切反革命势力及帝国主义决裂之一途。不然，你们的政治生命是要完全破产的！

南洋烟草资本家 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工人一日不做工，便马上要饿肚皮。一个工厂逼到七千多人都采用罢工手段，饿着肚皮来要求免除苛待，其被苛待到甚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南洋烟草资本家本来比别的资本家要会使乖些。他那双慧眼早已看清“工人团体结得坚牢”足以制他的死命。所以他对付罢工的战略，第一便是拆散工人团体：为返厂者给双资；升散工为长工；以开除威吓罢工工人；雇用山东打手，拦击罢工工人，贿赂巡捕，捉拿罢工工人。

工人肚皮饿到了十多天，一点解决的消息也没有，已经有点心慌胆怯，那受得起这般欺骗和威吓，所以一部分最软弱的便首先忍辱含酸的进厂，于是资本家乃借此大大的宣传：返厂的工人已有了若干，限工人九月十四日一律进厂，否则开除，这样一来，于是含酸忍辱进厂的便更加多了，然而坚持到底的还有两千之众，其势仍不在小。资本家乃别出奇计：一面贿通穆安素和斐斯两律士出任调停，满口担承他们可以为工人取得法律上的胜利，借此缓和工人感情，以便资本家从容宰割。可怜的工人，他们哪里会懂得这个迷人的八卦阵呢?! 一面却又收买少数工人，